

【理论经纬】

“文学性”理论的中国化阐释与 多维度延展

赖大仁

【摘要】从中国当代文论学术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引入“文学性”理论展开研究,既受到当代西方文论影响,也与我国当代文论观念变革和理论重建密切相关。“文学性”在一定程度上转换成本土化文学理论问题,得到多方面、多维度的中国化阐释,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创新发展。“文学性”理论的中国化阐释与多维度延展,总体进程是从语言形式论阐释,推进到文学审美论、文学本质论阐释,以及走向文化研究转向中的理论阐释与外向性延展,然后随着近期“后理论”转向而形成不断深化延展的阐释趋向。从内在理论观念来看,则是从比较单一视角的文学文本特性探讨,延展为多维度、综合性视野的理论探讨;从基于文本事实的抽象化文学本质特性的概括阐释,扩展到文学实践机制及其文学功能一意义的系统性阐释,推进了这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文学性”理论;中国化阐释;多维度延展;阐释空间

【作者简介】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江西南昌 33002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4.1.162~17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ZW002)。

“文学性”概念自从20世纪初问世以来,就引起人们的关注讨论,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理论问题,至今仍在不断讨论和发展演变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曾有人涉及“文学性”理论和使用过这个概念讨论有关问题,但影响十分有限。^①从中国当代文论学术史来看,过去长期以文艺反映论和文艺社会学等占主导地位,其他文论形态影响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借鉴外国文论,形式主义文论及其“文学性”理论也被引入讨论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文论知识或理论资源被引入与评述,使我们对这种理论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其转换为本土化理论问题,参与中国当代文论观念变革与重建。这后一个方面显然更值得进行理论反思和总结。总的来看,

我们对“文学性”理论阐释并非总是跟着外国文论走,而是跟中国当代文论观念变革和理论重建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

一、语言艺术论的理解阐释与理论延展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有两个特别突出的概念,即“文学性”与“陌生化”。前者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特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特性;后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即它不同于日常语言,能够达到反常化或奇异化的特殊效果。相对而言,“文学性”指涉文学作品的整体特性,是一个总体性理论命题;而“陌生化”则是文学性的重要生成机制和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从属性概念来理解。很显然,“文学性”作为总体性的语言形式论命题,标志着20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转向,其影响更为深远。中国新时

期文论最初也是从语言艺术论方面来理解和接受“文学性”理论,并引入当代文论话语体系进行研究阐释的。

中国新时期前的文学反映论等理论,虽有语言艺术观念,却较简单且意义有限。文学反映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突出文学的形象性;二是用文学语言创造形象反映生活,突出文学的语言艺术特性,因而文学反映生活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具有独特优势。^②这里的语言艺术特性显然处于从属地位,只具有作为反映生活的形式工具的意义。新时期文论变革趋向之一,是在外国文论影响下推进文学语言形式特性研究,力求把“文学是语言艺术”作为文学本体论进行探讨,“文学性”理论恰好被引进,成为文学语言艺术论观念变革的切入点和理论阐释的生长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从语言艺术本体论着眼进行理论阐释。在新时期文艺学方法讨论阶段,文论界就突出了语言形式方法论和形式美学研究,把语言艺术形式提升到文学本体论层面来认识。有学者指出:“形式概念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不是美学和文艺学的一般概念,而是关涉到美和艺术的本质或本体意义的概念。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美和艺术的本体存在怎样?在人类多少年来所追问和探寻这些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如前所述,有一种答案就是形式,即认为形式是美和艺术的本质或本体存在方式……研究美和艺术不能不在本质论或本体论的层面提问,不能不就‘形式’对于美和艺术的总体意义做出自己的阐释。”^③就文艺学方法论而言,就应当建立“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根本观念,把语言形式论和文学性理论引进来加以阐释。论者认为,“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它指文学的独特性,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文学形式,是形式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因此文艺学研究应当落到文学语言形式本

体上来,“文艺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本体’是指文学的形式、技巧和语言,即文学的存在方式——语言‘文本’(text),‘本体论’则是关于文学的语言文本的理论”^④。从这种认识出发,论者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主张建立“语言艺术”论的文学本体观,强调对文学的根本认识需要回到这样一个古老而平实的命题上来,通过文学语言形式研究来发现我们希望从中得到的一切,因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才是最靠得住的文学观;二是主张建立“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的意义’既包括可以言说的意识、思想,也包括不能言说的意味、直觉(后者更具文学性)。无论是可以言说的还是不能言说的,文学的意义都不是我们另外加进去的,而是蕴藉在它的语言形式中,没有‘形式’作为文学的现实和存在,‘意义’就没有存活之所。因此,文学之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当是文学研究的基本事实”。文学研究理应从形式出发,通过形式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如果“超越形式直奔主题”,那就是将艺术当作了非艺术,就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⑤论者基于对形式主义文论的认识,把“文学性”与文学形式作为同义词紧密联系起来,将其引向语言艺术的文学本体论加以阐释和强调,这既符合“文学性”理论本来的含义,同时也在当代中国文论变革中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和学术意义。

另一种情况是从文学文本/作品论着眼进行理论阐释。有学者考察现代斯拉夫文论,认为其中有两个理论最重要,即提出“文学性”命题和建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这两者密切相关,“对于‘文学性’的追问,是我们进入文学文本/作品理论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论者着力对这两种理论资源进行梳理和深度开掘,将其引入当代中国文论加以借鉴,寻求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通过对“文学性”理论的梳理和追问,对“文学性”的理解可以归结到两种视界中来:从本质主义视界来看,文学性是客观存在于文本自身的特性;而从反本质主义视界来

看,文学性则是一种由文本生成的环境、文本接受的语境所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惯例或机制,是某种外在的、被赋予文本的价值。这两者都相交于“文本”,都要以文学文本为基础,这样一来,“文学性”就会演变成“文本性”,使文学性与文本、文本性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然而,无论如何,“文学性首先还是体现在文学作品或文学文本上”。因此“对‘文学性’之追问必然要诉诸文学作品理论或文学文本理论。不聚焦于文学作品理论或文学文本理论在当代的建树,不清理文学作品理论或文学文本理论在当代的发育轨迹,不反思文学作品理论或文学文本理论在当代的进展与问题,对‘文学性’这一文学学的核心命题的追问,是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的”^⑥。基于这样的认识,论者致力于对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资源进行发掘与阐释,并在引入借鉴的基础上力求推进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话语的本土化建构。

此外,还有从其他相关理论视域展开的研究阐释。如有学者基于文本学理论,将文学性理解为文学的特殊性,即作为文学内容载体的语言文字与修辞技巧,由此阐释它作为文本理念与文本建构原则在文本主义理论系统中的独特意义。^⑦也有学者从文体学或文类视角切入对“文学性”的理解与阐释,通过探讨文学性内涵的多维性及其张力关系,将其纳入文类理论系统的建构中来。^⑧还有学者从语言学转向视野来重新审视“文学性”问题,探讨它在语言交往功能和话语陈述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意义。^⑨上述研究虽然视角和切入点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是基于语言艺术论的文学观念,将“文学性”理论引入其中加以阐发,从而拓展和深化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这既与国外的语言形式文论相通,又能弥补我国本土文论的先天不足,在当代文论变革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

二、文学审美论的理解阐释与理论延展

新时期之前的文学理论,总体上具有过于哲学化和政治化的特点,文学审美观念比较薄弱。新时

期以来,许多国外文论资源被引进,以改造和重建当代文论,文学审美论则是其中备受关注的理论之一。国外引入的理论资源既有欧美文学审美论,也有俄苏审美学派的理论,还有就是将“文学性”理论引进来加以阐释,以此作为建构当代文学审美论的理论依据。这里显然有一个理论逻辑转换问题,“文学性”本来属于语言形式论,但它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阐释张力,在中国当代文论变革的现实语境中,人们并不限于从形式主义文论本身,而是更愿意从文学审美论方面来理解。

有学者认为,对“文学性”不能仅仅从语言形式层面去理解,而应当从文学观念方面去理解,“文学是发展的,文学观念也是发展的,文学性也因此是变化发展的。有多少种文学观念,就会有多少种对文学性的理解”。中外古今有各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今天我们既然把文学的特性理解为审美,那么审美性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作为文学特性的审美性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可以理解为“作家在以情感去评价周围事物的时候,获得了自己的审美体验。如果作家把这种审美体验转化为语言文本,文学性也就产生了”。这种文学性具体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气息、氛围、情调、韵律、色泽等方面。^⑩论者的理解阐释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逻辑,即首先把作为语言形式的“文学性”转换成作为一般文学特性的“文学性”,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学观念,然后再把审美性界定为最根本的文学特性,这样文学性基本上就可以等同于审美性,以此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纳入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之中。

另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在以文学审美论进行立论时,把“文学性”理论引入进来进行阐释。论者认为,文学的审美特质既表现为内容的美,也表现为语言形式的美,文学的诗性语言所表现的文学性,正是这种语言的形式之美,这是“中外文学理论界定文学审美属性的一个重要根据,在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那里,它甚至成了文学审美特质的唯一标志”^⑪。

如果说前面的论者是从整体性文学观念层面把“文学性”理解阐释为文学审美特性,那么这里则是把“文学性”理解阐释为文学审美特质的一个方面,即文学语言形式的审美特性。应当说这种理解阐释更接近“文学性”理论的本来涵义,但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并不属于文学审美论范畴。论者之所以要如此转换阐释,是因为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语境中影响有限,将其转换为文学审美论进行阐释,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还有文论教材采用另一种处理方式,即在引入介绍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阐发对它的不同理解,然后归结到文学审美论上进行重点阐释。在作者看来,“文学性”概念虽然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在不断阐释中形成了多种观念,大致基于三个理论假设:首先,它是一个文学理论方法论概念,要把文学研究与社会、心理、哲学、历史、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区分开来,把文学理论或诗学视作语言学的一部分;其次,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差别,就在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别,因此就会导向注重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运用手法或技巧;“最后,文学性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关注。文学性说到底就是审美特性。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最终是通过语言的审美特性和非审美特性的差别而呈现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在文学性主张下,非审美的诸多层面——社会、心理、哲学、历史、政治等,统统被赶出了文学理论的领地”^⑫。如果说前两个理论假设都是基于形式主义理论本身,那么最后一个则显然是论者所要强调阐释的重点和落脚点。按照文学审美论观念来阐释文学性,其目的在于跟中国文学审美论相契合,从而适应当代文论观念变革发展的新要求。

此外,一些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好像并不理会“文学性”理论的由来和本来含义,往往直接把它当作

“纯文学”观念来理解,着重从文学审美特性和文学自主性、自律性方面进行阐释,借以对当代文学变革发展进行总结和反思。有学者分析认为,可以把1980年代看成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发生期,其特点在于形成“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自律性。这种“文学性”始终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为其内涵,随着各种新思潮出现,“表明‘纯文学’诉求开始表现其‘非政治’的特性。相应地,文学批评和理论领域开始构造文学的‘自足性’内涵,而其突出表征,则是一种有关纯粹‘文学性’或‘审美’的知识谱系开始建构出来。”正是由于这种“纯文学”自身知识谱系和合法性依据的建构及其在不同领域同时展开,就构造出一种普泛性审美知识谱系,包括文学理论领域内对有关文学自身理论谱系的确立,以及促进形成了现代文学的“重写文学史”思潮。^⑬也有学者在讨论文学性与当代文学批评问题时,直接把文学性与文学自主性、自足性、自律性等联系在一起,将其理解为文学的艺术审美特性,把人的经验、想象力、创造力、原创力、独特性、艺术趣味等因素,都看成是文学性的核心内容,它构成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终极依据。^⑭这与上述从“纯文学”角度看待文学变革发展的思路颇为相通。不过论者后来的看法似乎有些变化,认为仅仅从1980年代“纯文学”思潮角度理解和讨论“文学性”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超出这种视野,破除“纯文学”概念对文学的某种封闭式理解,应当将“文学性”概念置于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才能重新激发文学的活力和开放性。^⑮总的来看,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学性”的理解阐释,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抛开了语言形式论的本来含义,明显偏重于从审美主义立场出发,这可能既基于当代文学研究本身的特殊语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代文学审美论观念影响,是一种比较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三、文学本质论的理解阐释与理论延展

无论把“文学性”看成文学作品的文本特性还是

文学的一般特性,显然都与文学本质问题相关,因而将其引向文学本质论研究似乎更加顺理成章。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在谈到比较文学研究时说:“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⑥韦勒克与沃伦合著《文学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构造了以文本论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框架,试图把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整合起来,把对文学本质特性的理解阐释纳入其中。有学者认为,韦勒克关于“文学性”的阐释,是上承俄国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思路,下启后现代解构主义泛文化研究,将“文学性”从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提升为文学的本质,并且突出了其虚构性、创造性、想象性的内涵,这种“文学性”观念转变在现代文论史上具有特殊意义。^⑦这种认识理解是比较有启发性的。

在中国当代文论语境中,研究者更容易把“文学性”理解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即转换为文学本质论命题来理解和阐释。有学者在阐释这个概念的内涵时说:“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形象思维和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是文学性最基本的特征。”^⑧这显然是从文学本质特征方面来理解和定义“文学性”概念。也有学者在追溯了文论史上有关文学性的各种理论观念之后,最终将其归结到文学本质属性来认识,认为“作为‘文学’的定义,文学性主要涉及文学概念的内涵。文学性回答文学有哪些本质属性,处理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观念……文学的定义总是随时代而变迁。因此,文学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上的文艺观点极具流变性和多样性”^⑨。这显然大大超出了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转换成了文学本质论的理解阐释。还有一些学者从比较诗学视角加以观照,看到了各种不同话语体系对“文学性”的理论阐释和界定各有不同,而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几种认识,直到今天也仍是领

悟和理解“文学性”最为重要的着眼点。当今重新讨论“文学性”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和考辨这些理论视点和话语方式在现代生活世界背景下的有效性,从而克服它们的局限性而寻求新的超越。^⑩这显然也是把文学性当作了文学的本质特性来理解和探讨。

此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讨论之后,一些新编文学理论教材力求进行文学观念以及理论话语重建,这就不能不重新面对“什么是文学”这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中国文论界的讨论情况来看,人们既感到当代文论中的本质主义弊端值得批判反思,又觉得完全否定文学本质论不科学,所以应当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理论观念和话语重建。新编文论教材既不能回避文学本质论问题,又不能回到过去那样的理论形态,那么就只有引入与此相关的某些新的文论话语来进行理论阐释,而引入“文学性”理论话语或许是最恰当的选择。当然其中各有不同情况,如有的文论教材引入“文学性”话语,对此进行具体阐释时区分了两个层次:一是按照形式主义文论本来的理论内涵,评述其作为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性及意义,这本来就与文学本质论相关,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超出它的本来含义,将其置换为“什么是文学”的基本问题,或定义为“文学性质”的理论命题,以此观照和评述中外古今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观念。按照这样的理解和定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各种有关文学特性的理论观念,全都置于“文学性”的理论命题之下加以阐释。于是论者就从历史观照着眼,把历来关于文学性质的共识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语言性、情感(心灵)性、意象(形象)性、想象(虚构)性,从而形成对这个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综合性认识,体现了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念。^⑪也有的新编文论教材并不顾及“文学性”概念的本来含义,而是直接把它理解为文学本质特性,进而从反本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文学研究虽然必须聚焦于“文学

性”，但并不存在某种亘古不变的文学性概念，应当放弃本质主义的追问。以往通常把“文学是什么”与普遍的文学性问题联系起来，或者从“纯文学”认识文学性，或者把文学经典归结为文学性等，都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说，对文学性的定义的研究是对于众多文学经验的概括、提炼、删繁就简，那么，进入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来定位文学要包含着远为复杂的程序。”^②于是，论者理所当然地把“文学性”问题引向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即在“关系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把文学本质特性问题跟文学的各种内部和外部关系联系起来，引向开放性和多维度的理论探讨，显示出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新趋向。

总的来看，在当代文艺学反本质主义讨论之后，文论界对“文学性”问题的研究探讨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外国文论资源引入进来，从文学语言形式特性入手加以阐释，引向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和阐发论者的理论观念；另一种是直接跟“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关联起来，即转换成文学的普遍本质特性问题展开探讨，拓展出更大的阐释空间。由于这种阐释空间不断拓展，在进一步发展演变中又形成不同向度，有的继续向外扩展，演变成文化研究转向中的“文学性”扩张蔓延；有的向内进行深度开掘，走向对“文学性”理论内涵更加富于创新性的深入探讨。下面再分别考察。

四、文化研究转向中的理论阐释与外向性延展

20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也出现了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新趋势，这对“文学性”理论的外向性阐释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人们对文化研究转向各有不同认识，因而各种“文学性”理论阐释也显得比较复杂，总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引入国外“文学性”扩张与蔓延话题进行阐释，借以推进中国文化研究转向。国外解构主义文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打破审美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观念，推动文学研究走出自我封闭的“围城”，走向

面对社会现实的更加多元开放的文化研究。由此也带来对“文学性”的解构，即打碎作为整体性文本结构的文学性，使其成为碎片化的文学性要素或成分。文学性成分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于几乎所有文化形态中，即所谓“文学性”的扩张与蔓延。美国学者辛普森把这种现象叫“后现代文学性统治”或“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他认为“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③这种文化研究转向及其“文学性”扩张与蔓延，其实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终结。这种文化研究转向与文学“终结论”纠缠在一起，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论。

这种现象对中国文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21世纪初有学者著文介绍和评述了辛普森等人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说：“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要注意区分作为形式主义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撒播并渗透在后现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学性，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又说：“由于后现代文学终结和文学性统治的双重性，以统治的文学性和终结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必将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且任重而道远。”^④论者显然认同上述观点，认为如今处于后现代文化全球化扩张时代，文学边缘化与文学性蔓延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当代文学研究应当顺应这种变化才能有所作为。有些学者呼应这种看法，认为随着历史演变，把审美性、文学性作为文学艺术根本特征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已引起全球艺术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以及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等的广泛关注”。中国文化艺术场域同样发生了整体转型，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了，它在越界、扩容、转型，学界应当适应这种变化

而重新选择和确定研究对象与边界。^⑤也有学者指出,文学性扩散与文学“祛魅”过程是一致的,“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⑥。文学性扩散表现为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也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出现了全面的文学化倾向。这种文学性扩散构成了对文学艺术的“祛魅”,需要我们调整姿态进行研究和应对。这是偏重于对“文学性”扩张与蔓延的肯定性理论阐释,借以促进中国当代文论的顺应性转向发展。

二是对提倡文化研究转向和“文学性”扩张蔓延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并非普遍现象,以此否定文学性和文学研究没有道理。有学者分析认为,“文学性扩张”的说法颇为流行,实际上是反本质主义思潮带来的,倡导者从来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加以限定,所论显得含糊其辞。他们将商业文化活动中的文学性与文学中的文学性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用“文学性扩张”可以去阐释一些流行文化现象,但是无法阐释文学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学的发展问题。^⑦也有学者认为,一些人描绘的所谓文学性扩散蔓延其实有些似是而非,如果把现实生活中一切符号活动或语言特性的表达,以及社会科学和一切文化艺术产品都看成具有文学性的,那么从古至今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既然如此,现实中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文学性呢?讨论这样的文学性扩张蔓延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⑧在这些质疑者看来,抛开“文学性”的本来含义,过于宽泛地谈论文学性扩张蔓延是一个理论误区,某些似是而非的讨论不仅无益于文学研究,反倒容易带来当代文学研究的迷乱和误导,这无疑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三是主张辩证地认识分析“文学性”扩张与蔓延问题,不应简单化地肯定或否定、顺应或拒斥,面对各种现实挑战,需要坚守应有的文学性立场。有学

者认为,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性消散与蔓延的种种“症候”来看,辛普森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和意义。但是,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文学性消散或文学本体精神逃逸并不是值得欢庆的事情,这种现象以及隐含其中的文学精神问题是更值得引起关注和反思的。^⑨笔者也认为,由于图像化、网络化使后现代文化不断扩张,把传统文学形态挤向边缘,才带来了文学性扩张与坚守的问题。这里的“文学性”并不仅限于传统文学形态的语言艺术特性或某种文学本质,而要从“文学是入学”出发来理解文学的根本特性与价值功能,这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时代尤其具有救治人心的特殊意义。^⑩

总之,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以及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下,人们对当代文学发展现实各有不同认识,所秉持的文学观念以及对“文学性”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观点各有道理,能够促进理论反思,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学性”理论阐释的新进展。

五、“后理论”转向中形成的深化阐释趋向

近一时期出现的“后理论”转向新趋势,主要是针对此前所谓“理论”时代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的弊端,以及文学性扩张蔓延导致自我消解的现实,要求文学研究重新“回归文学”,由此引起“文学性”问题的重新探讨。有西方学者在评述卡勒等人的理论观点时指出,由于文化研究转向背离文学走得太远,“显而易见,被忽视的是文学和那些文学性的东西”,这势必使文学的特征与批评锋芒丧失,“因此他合理地指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这样,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归卡勒早期著作中关于诗歌与叙事作品的作用和接受之类的研究了”^⑪。这种要求文学研究回归诗学和文学性的观点,在卡勒、伊格尔顿、威德森等人那里各有不同的表述,成为西方文论“后理论”转向的普遍性趋向。^⑫在此影响之下,近期中国文论界展开了对此前文化研究转向的理论反思,同

样呈现出要求回归文学研究和进行理论重建的总体趋向。随之而来,“文学性”就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需要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推进创新性探讨。从近期文论界的讨论情况来看,文论界的讨论主要在以下一些方面不断推进。

一是对“文学性”理论内涵进一步深入探讨。如前所述,在“文学性”理论引入之后,学界已经从语言艺术论、文学审美论、文学本质论等不同方面展开研究阐释,既有进展也存在某些局限,在经历理论反思之后,有可能推进到新的理论层面深化探讨。有学者认为,过去本质主义诗学研究存在明显问题,对文学性问题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内部属性,而要看成是表征文学多元综合样态的开放性话语结构:不能把文学性视为文学恒定的本质属性,而要以历史化姿态看待文学性生成。在方法论层面上,要从多层面形构文学性话语的家族谱系,由此认识和把握文学性的丰富性、开放性及其辩证综合特质。^③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问题在于,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学性的辩证综合特质。对此,学者们又有不同见解。有学者指出,应当对已经形成的“文学性”和“纯文学”观念进行修正,对“文学性”内涵的理解,从文学作品的语言表现层面,深入到情感存在和情感生成层面,这是“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本体性存在层面,是用“大文学”观念来取代“纯文学”观念。如果从人类学视野来看,“文学性”内涵应当包括作品文本的语言文字符号性、人类情感性、文学修辞性等,由此统观一个言语文本或书写文本,才能达到对文学性的全面完整认识。^④也有学者认为,“文学性”不应被“纯化”,而应当被“复合化”,即关系化、整体化等,成为“文学的兼文本性”。具体指文学作品中包含哲学、政治、历史等非文学的文本成分,从而被整体化为一个全新的关系性文本,这样也就带来文学功能的整体性与关系性。“兼文本性是文学作品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没有一篇文学作品能够逃避兼文本性。越是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学作

品,其包含的非文学文本就越丰富,它的兼文本性就越突出。”由此重新认识文学性,能够纠正以往研究的绝对论与相对论。它重视从文学实践来认识文学性,是属于生成论的文学性研究。应当反对以往现成论和不可知论的文学性研究,“唯有文学的兼文本性才能担当起文学性研究重组的任务”。^⑤从以上这些探讨来看,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和紧扣文学性的本质内涵问题,又力求超越以往比较单一化的思维局限进行深度开掘,能够深化对文学性的丰富内涵及其辩证综合特质的理论认识。

二是对“文学性”的不同类型加以区分和比较研究。自文化研究转向以及“文学性”扩张蔓延讨论后,单纯化和封闭性的“文学性”观念被打破,其开放性和多向度拓展已难以回避,因此就有必要转变观念,对这种现象进行合乎学理逻辑的理论阐释。这里的问题在于,应当坚持开放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固守某种纯文学观念,也不能像后现代文论那样完全解构过去的文学观念,而是要立足于当今时代文学和文学性的开放性发展,从文学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关系着眼,对“文学性”的不同向度或类型进行区分,从而在比较视域中推进研究。有学者认为,面对“文学性扩张”的现实及其理论危机,可以适当区分文学的“文学性”与文化的“文学性”,将文学研究的重心定位于前者,而把“文学性扩张”之类研究归入后者,或建立新的学科进行专门研究。两种“文学性”研究的诉求和旨趣大不相同,区分开来既可以适应文化研究发展的需要,也可以有效化解文学研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而实现自我救赎。^⑥这种设想针对当今文学观念复杂多样的现实,有利于化解不同文学观念之间互不相容的矛盾冲突,使不同向度或类型的“文学性”研究各得其所,不失为一种明智之论。但问题在于,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性”研究各自的目标和意义何在?彼此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性与互动性?这些值得进一步探讨。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康德对“纯粹美”与“依存美”的

区分获得启示,将文学性划分为“纯粹文学性”和“依存文学性”,前者重在研究文学形式特性,更接近形式美学的本来含义;后者重在研究文学内容特性,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内涵。整体上看,文学不能脱离“纯粹文学性”的形式美,但文学的意义价值更主要体现在内容层面的“依存文学性”,可以按照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原则,将这两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建构新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⑤这种文学性重构的设想,一方面基于对文学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辩证认识,另一方面引入康德美学理论进行转换阐释,使其得到合乎学理逻辑的理论延伸,比较富有启示意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以前的文学性研究主要从事事实层面说明“文学是什么”,是否可以调整思路和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从价值层面探讨“人为什么需要文学”,由此追寻文学性生成的人学根源。人是一种“二重化在世”的存在,人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之外,还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来达到价值平衡。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正是人所生活的两个不同世界的区分。这就意味着当今的文学性研究,需要走出过去的文本论思维模式,进一步走向文学本体论探讨。^⑥这样的区分与比较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有益于更好地理解文学性的开放性及其辩证综合特质。

三是对“文学性”系统质与功能论的进一步探讨。“后理论”转向的一种新趋势,在于拓展“文学建制”(或文学机制)的理论视野,从而把文学与文学性研究置于其中加以观照,这样就从原来的文本论或本质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文学功能论或意义论的探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较早提出“建制论”观点,反对仅仅从文本论或本质论意义上理解文学,主张把文学看成一种“奇怪的建制”,把它放到社会文化结构系统中去认识其特殊功能和作用。^⑦此后一些欧美学者如卡勒、伊格尔顿、威德森、安托万·孔帕尼翁等人,也纷纷从文学建制、策略、功能、意义等着眼,重新理解和阐释文学性。^⑧中国学界也受此影响,显

示出这种创新性探索发展趋向。有学者阐述说:“如果文学性问题稍加延伸,就会扩展到文学功能问题。”过去本质主义观点只强调文学自身的存在,它自己决定自己的本质,而“非本质主义的观点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对话,文学的功能就在对话之中体现……非本质主义不是泛泛地考察文学的一般功能,而是集中关注某一个时代的文学承担了什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是功利主义时代最为常见的提问”。如今从表面看来,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文学如同种种文化神经织入社会的各个部分,产生明显的或隐蔽的作用”。^⑨因此,论者认为应当从“关系主义”出发理解文学与文学性,注重考察文学的共时性结构关系,目的是突出文学在这种结构关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并强调“文学性与开放的研究”,引入伊格尔顿、威德森等人的文学机制论和功能主义理论观念进行阐释,跟文学特性阐述遥相呼应,体现了论者的“关系主义”主张和“机制—功能论”的文学观念。^⑩也有其他学者积极呼应,认为经历了反本质主义讨论之后,应当走出本质主义和历时维度的文学性研究,“从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转向生生不息的关系主义”,即转向共时性结构的文学建制与功能的探析。“文学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建制,它与现代学科体制关系密切,因此,文学性当然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文学性话语的生产是文学学科、文学理论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必选动作与压轴节目。”^⑪从“关系主义”角度观照特定历史空间中的文学,它由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组成,结构内部多种关系在相互依赖与制约中维系相对稳定性,文学的地位、功能和意义也都取决于它所在的结构系统。这里既吸取了结构主义着眼于关系分析的策略,又修复了它所失去的历史之维。从共时性结构关系来理解文学和文学性,目的在于追问当今时代文学能够做什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功能,这应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此外,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把文学“机

制一功能”论引入具体文学与文学性的研究阐释。有学者指出,当今需要重新激发文学和文学性范畴的活力,如果说过去的纯文学理念等导致了“文学性”理解的固化,后来强调文学研究回到社会历史视野又造成了“文学性”的窘迫,那么如今有必要引入开放性的“文学性”范畴。这就是要重审“审美现代性”,重建审美与历史的联系,重新激活文学与政治、历史、社会的关系,在一种张力形态中理解文学性,既为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也释放文学性的活力。“把文学性放在了一个整体化的动态结构中进行考察,重新挖掘文学性的‘结构——功能质’,也就有可能把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污名化了的审美意识形态打捞回来,重建一种‘审美—文学性研究’。”^④论者以日本学者竹内好对鲁迅“文学的自觉”问题研究为例阐述说,竹内好不是像中国学界那样仅从文学自律性意义上理解,而是从更深处去理解,鲁迅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文学的自觉”,这里对文学的理解显然是诉诸伦理实践的,是一种作为机制的思想。这就使我们认识到,“鲁迅的‘文学的自觉’的核心其实是主体的真正自觉的过程,是在处理伦理、宗教以及思想的机制的过程中获得的原理性的自觉”。^⑤这里突出了把文学和文学性作为一种机制和系统功能质来理解的观念,跟上述文论界的理论倡导是彼此呼应的。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引入“文学性”理论进行的研究,既受到当代西方文论影响,又与中国当代文论观念变革和理论重建密切相关。实际上我们的理论阐释并没有全都跟着外国文论走,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转换成为本土化文学理论问题,再展开多方面、多维度的探讨,推进了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文学性”理论中国化阐释与多维度延展的总体走向,是从最初的语言形式论阐释,逐渐推进到文学审美论、文学本质论等文学普遍特性阐释;从比较单一视角的文学文本特性探讨,演变为多维度、综合性视野的

理论探讨;从基于文本事实的抽象化文学本质特性的概括阐释,扩展到文学实践机制及其文学功能一意义的系统性阐释,如此等等。这样就打开了“文学性”理论的多维度阐释空间,能够推进这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当代文论创新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①参见方珊:《俄国形式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传播与启示》,《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

②参见蔡仪主编:《文学概论》第1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绪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绪论”。

③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④赵宪章:《语言·形式·本体》,载《文体与形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⑤参见赵宪章、曾军:《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反思——赵宪章教授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赵宪章:《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⑥周启超:《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的一个轴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81、100-101页。

⑦参见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49页。

⑧参见陈军:《文类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章。

⑨参见汪正龙、张瑜:《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章。

⑩以上引述参见童庆炳:《谈谈文学性》,《语文建设》2009年第3期。

⑪王先需、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⑫周宪:《文学理论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⑬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⑭参见洪子诚、吴晓东:《关于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的对话》,《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⑮参见吴晓东、罗雅琳:《通向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学性”——吴晓东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

⑯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0页。

⑰参见徐熙:《历史视域下韦勒克的“文学性”观念探析》,《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

⑱史忠义:《“文学性”的定义之我见》,《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

⑲周小仪:《文学性》,《外国文学》2003年第5期。

⑳参见曹顺庆、支宇:《重释文学性——论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㉑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100页。

㉒南帆等:《文学理论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㉓大卫·辛普森:《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关于半—知识的报告》,余虹译,载《问题》第1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㉔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㉕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㉖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㉗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㉘张开森:《文学性真在疯狂扩张吗?——与陶东风教授商榷》,《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㉙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

㉚赖大仁:《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㉛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

㉜参见赖大仁:《“文学性”问题百年回眸:理论转向与观念嬗变》,《文艺研究》2021年第9期。

㉝李艳丰:《“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话语反思——兼论元叙事的弥散与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困境》,《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㉞黄永健:《“文学性”及“文学性”新建构——文学的人类学省思》,《晋阳学刊》2010年第5期。

㉟李涛:《文学性·兼文本性·文学文化——文学性问题研究之困境与出路》,《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㊱马睿:《“文学性扩张”与文艺学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㊲范永康:《纯粹文学性与依存文学性:文学性新论》,《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

㊳张震:《“文学性”反思与作为“不同的世界”的文学》,《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㊴参见雅克·德里达:《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载《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㊵参见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2页;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9-191页;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㊶南帆:《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㊷参见南帆等:《文学理论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章、下篇“引言”部分。

㊸王伟:《文学性、反本质主义及空间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

㊹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吴晓东、罗雅琳:《通向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学性”——吴晓东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

㊺洪子诚、吴晓东:《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对话》,《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